

岁月留痕

——我的2013

■ 宋养琰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2013年,我也在逐梦,我的梦有的已经实现,有的将要实现,有的期望实现。

首先,在这一年中,我曾梦想,多读点书,读点好书;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年我有选择地读了一些史书和古书,读史使人明智,我的确从中感受良多,受益匪浅。“以史为鉴”对我来说,以下几个问题更为关注。

其一,历史告诉人们,三国时期,杨修主持曹操兴建一座“相国门”,开始就搞得富丽堂皇,巍巍壮观;曹操见后,命人在“相国门”上写个“阔”字,杨修领悟后,随即从简改建。明末李自成到了后期,自以为江山在握,该享乐了,于是朝野上下,天天“过年”,结果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四起,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红楼梦》中荣宁二府,之所以“内囊尽丧”,就因为府内“安富尊荣者尽多”,而“运筹谋划者无一”。

前些年,在我们的社会里,从农村到城市,从上到下,广泛流行着一种“阔绰风”、“吃喝风”、“公费旅游出国风”。如有的企业因经营不善已危如累卵,仍送往迎来、杯盏交错、投桃报李,照样安之若素。不久前,有一位华侨,为家乡办教育,捐资数万。可是,当地长官为了表示庆贺,一次宴会,就把这数万元花得尽光。再就大兴楼堂馆所(还有别墅)来讲,毫不夸张地说,已经到了“屡反屡犯,屡屡反屡屡犯”的地步!至于“吃喝风”更是甚嚣尘上。诸如,领导下基层,不大摆宴席,叫礼遇不周;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工作午(晚)餐、开工大典、周年大庆、周年大纪,等等,不一而足,挥金如土,其浪费之大,令人发指!还有人利用职权大办婚嫁丧娶,不惜用警车开道,耀武扬威,招摇过市,收礼敛财,大肆挥霍。在西方社会里,有一种“文明消费”和“野蛮消费”之说。野蛮消费是属于野蛮行为之一,既有碍社会风尚,也阻止历史进步。这种超越常规的浪费,实难摆脱“野蛮消费”或野蛮行为之嫌。

历史反复证明,任何一个民族或社会,如果人们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实践中对财产的关切度很低,不太重视对财产的有效占用,积累和增殖,一味渴求消费,无止境地对财富的存量和增量任意挥霍和浪费,就是说,对财产“用之无道”,那么,这个民族或社会,是很难有生机和活力的,也很难兴旺发达的。

其二,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义利之争”。孔孟之道,重“义”而轻“利”,但这种“义”经过几千年的实践,并未能真正释放出中国新的更高的生产力,相反却使中国长期沉沦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中。西方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重“利”而轻“义”,但它早早地把他们的社会推进到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以为,“义”和“利”原本不是完全对立的,处理得当,可共存共荣,相得益彰。因为市场经济就其本性而言,在重“利”的同时,也讲求“公开”、“公平”和“公正”,讲求“公信”和“公德”,讲求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促进,实现社会资源有效配置,其“义”就深寓其中。愈是发达的和完善的市场经济愈能体现这些原则得到充分地贯彻和实现,市场经济的进步作用也更加显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重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公平和正义”、“公正和正义”也是不能分离的,可是,我们与“公平和正义”、“公正和正义”相去太远。

历史上的“桃园三结义”是在三国鼎立的情况下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用今天的话说是“利益共同体”。

其三,历史还告诉我们,中国从1840年

2013年的日历已经翻过去了,和往年一样,很自然地使我反思过去一年我是怎样度过的?

鸦片战争以来,饱经了外国列强入侵的苦难和失败,堪称“国耻日”的日子太多了。可是,很难理解,为什么当一部新拍摄的故事片《甲午大海战》在一个大城市首映时,在宽广的大厅里,观众寥寥无几。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国人对这样的“国耻日”似乎淡忘了,有点麻木了!我总认为,一个健忘、苟且、没有耻辱感的民族是不会有太大希望的。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耻辱感是人类捍卫自尊的思想基础,是国人追求自强不息的强大动力。知耻而后勇,不对“耻”进行沉痛的反思,不从灵魂深处唤起“雪耻”的革命,就不可能自觉地产生发奋向前的冲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就会像一只蜷伏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

纪念“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奇耻大辱,不是在向大海深处为幽灵撒几片花瓣就能了此心愿的。

永远不要忘记,列宁的名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其四,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改革。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就是规模较大的改革,这场改革基本上成功了,它奠定了随后秦国一统中国的基础。后来西汉末年王莽的新政改革,北宋时期王安石的改革,清末时期光绪1898年的戊戌变法改革,都先后失败了。为什么呢?现在看来,改革成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敢不敢在根本制度上“破旧立新”。商鞅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是他在经济方面对所有制这一根本制度实现了真的突破。“废井田,开阡陌”是他改革的根本攻略。所谓“废井田,开阡陌”就是把当时以“井田”存在的“公田”分给个人,实行土地私有制。就当时而言,只有这种改革,才能化解当时社会深层次的矛盾,解放生产力,扩大社会财富的生产,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包括改革者的需要。处于被改革的,因为改革后所带来的经济繁荣,财政收入增大,也从中得到好处。另外商鞅还确立了一条最重要的改革原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因此,在2300多年前的中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就已经提出并得到公认。而王莽、王安石、光绪等人的改革,只是对旧制度作修修补补的改革,至多调整或实现社会利益再分配,这种改良型的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的根本矛盾,不能解放生产力,反而激化社会矛盾,增大改革的阻力,使改革无法进行下去,因而改革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今天,我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效,也是因为在本根本制度上敢于“破旧立新”。例如,在农村,破除公社所有制,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制;在城镇,打破公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有和私营经济,发展混合经济等。中国古诗有云:“万紫千红总是春”,从而调动广大农民、城镇市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破除计划经济,使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有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曾说过:倘若你给我一个好的制度,我可以把沙漠变成良田;反之,我只能把良田变成沙漠。

制度,特别是所有制,它构成任何一种社



会的经济基础,是根本性的制度。今后,仍必须下定决心,将制度改革进行到底。

其次,2013年,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实现了我多年来心向往之的赴美旅游的梦想。

我记得有位名人说过: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就会以为你的脚下就是世界。我也非常喜欢宋代理学家刘蕡说过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我的远在塞外的朋友也曾多次对我说:作为学者,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由于我的水平有限,很难体会他们所言所涵盖的深远意境,但我相信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因而我在实际中努力践行他们对我的进言。2004年,我去了欧洲,游览了十几个国家;2005年我又去了澳洲,游览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收获颇丰。这次我去美国,也早在计划之中。

出游前,我曾想,不要当单纯的“游客”,而要当个“旅行者”。就是说很想对出游的国家,能游出点品味,游出点惊喜,游出点学问或说法来。因而在动身前,除对出游的地方一般情况有所了解外,还对所游之地的现状、历史踪影、文化轨迹、风景名胜、风土人情等,有较多的认知。为此,特翻阅和研读一些与此有关的资料。

到了美国,我游览了加州和内华达州,以及美国西海岸的一些重要城市,如洛杉矶、旧金山等,其中使我感触最深的莫过于以下两个城市:一个是加州的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San Diego),圣地亚哥位于太平洋的西岸,因海岸线在这里打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港湾,这是加州最大的天然深水港,因用于军事,成为军港,是美国海军重要的基地,它扼控太平洋西部和东部海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总部、海军第3舰队司令部及所属部队机构都驻扎在这里。我到圣地亚哥最感兴趣的是想看看这个对外开放的军港。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停泊从1992年退役下来的美军中途岛号航母,现在已经成了一座航母博物馆供游人参观,门票是20美元。航母分上中下三层,下层是水兵生活区和弹药库,中层是飞机库,上层有宽阔的飞机跑道和指挥塔台,甲板上停着许多二战退役的飞机。航母附近,还有几艘不知是现役或退役的军舰。离航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的港湾,里面停靠着许多各类军舰,好像是一个军舰制造厂。

这个港之所以对外开放,明显地是要张扬或显示它穷兵黩武的威力。

今日的圣地亚哥,已成为一座现代化城市,市容绮丽多姿,一年四季棕榈婆娑。市中心的对岸,是富人居住的美丽小岛,树荫下的各式各样的别墅,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极为豪华。这里离墨西哥近在咫尺,驱车只要15分钟。当我们的汽车行进到于市中心和岛之间的跨海大桥之上时,海港的全貌可一览无遗,颇为壮观。圣地亚哥是旅游的好去处。

另一个是上百年来赚世界之财而使美国

致富的堪称世界最大的赌城——拉斯维加斯(Las Vegas)。拉斯维加斯是内华达州的最大城市,也是一座在沙漠上崛起的不可思议的城市。

拉斯维加斯是以赌博业为中心的世界旅游圣地,是被富人看作是吃喝嫖赌的人间天堂。市内赌场星罗棋布,据说有200多个,最大的建筑面积达30万—40万平方米。它们之间争奇斗艳——当我走进拥有3000台老虎机的巨大赌场时,仿佛进入了一座光怪陆离的迷宫,那成千上万台老虎机纵横交错地摆满了整个大厅及其每个角落,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机器沉闷的旋转声和金钱叮叮咣咣的散落声;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赌场门前,都闪烁着五彩缤纷霓虹灯,活像一头头张着血盆大嘴的“吸血鬼”,它在创造出一些奇迹的同时,也在为一些人挖掘了地狱或坟墓。

拉斯维加斯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夜城,世界上十家最大的度假旅馆就有九家在这里,堪称世界上最豪华、最辉煌的城市。夜晚是拉斯维加斯的良辰美景,也是这座城市旺盛生命力的所在。每当夜幕降临之时,五彩缤纷的灯光激活了这座城市。在豪华的广场和街头巷尾,人们可以定时看到用现代科技模拟的火山爆发和加勒比海炮火连天的海盜大战,其情其景逼真、气势宏伟磅礴,让人心惊肉跳。许多建筑、喷泉、雕塑等,设计精美,造型奇特,令人叹为观止。人们常说:“没到过拉斯维加斯,就不算到过美国。”此话并非言过其实。

据说,拉斯维加斯平均每年接待世界各地的游客高达4000万人次,其中主要是赌客,约2000万人次,大多是回头客。一年四季,世界之财从全球各地源源不断地流到这里,是美国的“聚宝盆”、“摇钱树”。

看了上述这两个城市之后,有位美国友人告诉我,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仅是美国),要想致富,光靠内部的积累是远远不行的,必须从世界范围内捞钱。从世界范围内捞钱,不外两手:一手要硬,一手要软。由此可清楚地了解到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首富,就因为用尽了软和硬兼施的两手,美军和美元就是这两手的具体体现。拉斯维加斯和圣地亚哥的存在和发展,充分印证了美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还有人告诉我,人在途(旅行)中,有两种类型:一是观光型,一是思考型。观光型说的是有些人只是“游山玩水”、“走马看花”,不去思考,不善思考。我想,我不是那种人。我要在观光中去感受,在感受中去思考,边感受,边思考,从感受和思考中提高认知,增长见识。

说实话,我不是文学家,不会写散文,更不会写游记。游记性的散文更难写,写不好就成了流水账。但我总是想,外出旅游,尤其去西方世界的旅游,很想把我亲眼看到和思索到的一些真实情况,来验证过去我从书本上、报刊上或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关于西方世界的一些说法是真还是假,是错还是对?如今,我

真的做到了,用真实的眼光,来审视这个西方世界,理解这个西方世界,认识这个西方世界。

从这些旅游中,我还深深地感到,旅游也是一种“读书”,是更大范围、更为深远、更加实际、更有意义的“读书”,读的是一部“大书”。古人云:“学者云游四方,尽见政治经济,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见闻,则为有益于学者矣。”现在看来,“行万里路”的确开阔了我的视野,启迪我的智慧,增强了我的见识,丰富了我的人生,总之对我是大有好处的。

再次,在这一年中,比较圆满地实现和完成了我年初制定的写作和科研计划。

2012年下半年,我按合法程序从有关方面领取了为期两年的离退休人员个人科研课题计划,题为《我的经济观、改革观和发展观》(约80万字),经过努力,到2013年底,已经完成了全文的初稿;有望2014年上半年(提前半年)即可完成定稿并结案。我曾想,如果健康状况许可,我还想将这个课题分成三本书来完成:《我的经济观》、《我的改革观》、《我的发展观》,字数可达90万。

在2013年中,我先后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散文和论文若干篇。其中包括:《魂牵梦绕的故乡》(见《太湖徐风》2013年第1期)、《耄耋老人思故乡》(见2013年5月10日《宿迁晚报》)、《我的2012》(见2013年4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在人大读研究生》(见2013年《敦教日月换新天》一书)、《改革六个矛盾,实现改革红利最大化》(见2013年2月2日《经济学家》)、《力挺名牌战略,实现强国之梦》(见2013年9月14日《经济学家》)、《警惕:城市化的陷阱》(见2013年6月15日《企业家日报》和《经济学家报》)、《城市化和田园经济学》(见2013年6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精心打造和稳妥释放资本的正能量》(见2013年8月24日《经济学家》和2013年9月2日《企业党建报》)。另外,还有几篇文章,发表在《人民网》和《博客网》上。

我过去是读了一些书,写过一些文章,现在感到还远远不够。我感到,一个人首先要了解自己,了解社会,了解自己的国家。今后还想继续努力,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不仅要读和写经济理论的书和文章,还要读和写其他方面的书和文章。当然,毕竟年岁大了,不能要求过高。

2013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人老多病,这年得了两次小病(感冒)。病中悟出点《六然人生》的道理,这“六然”是:“来之偶然,去之必然,为之当然,处之泰然,抚之坦然,顺之自然。”我的一生,就“为之当然”来讲,我用心了,我尽力了,我知足了,因而,我回心无愧、无悔了。

恒者行远!今后,在有生之年,仍需保持赤子之心,抬头望远,继续在我认为正确的道路上行进。

(此文为了敬告亲友我还潇洒地活着!)



■ 应宜逊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授、浙江地方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上接02版)

2.在商业性银行中,不同档次银行的“退出”门槛及操作方式应当有所差别。

商业银行的经营亏损与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就要“退出”,不能等到资不抵债、资本充足率为负值时才“退出”,否则,存款保险公司就会赔得“底朝天”,结果等仍然不能摆脱财政“兜底”的格局。同时,大银行与小银行的“退出门槛”应当有适当的差别。这是因为,大银行的财务状况相对较为稳定,起伏较

建立银行“市场退出”制度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小,而小银行则相对较不稳定;二则,大银行往往有发达的机构网络系统,其商业价值巨大,并且尚未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而小银行则缺乏这种资产。

“退出”门槛是强制性的,一旦达标,便要强制“退出”。在指标设置上,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档次:①县域及以下银行;②省域银行与市域银行;③全国性银行及其他上市银行。具体指标大致如下:县域及以下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监管标准(10%)的一半(5%)时,必须强制“退出”;省域银行与市域银行允许降低一个百分点;全国性银行及其他上市银行则允许再降低一个百分点。

由于商业银行的“社会性”很强,其“退出”不免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震动,规模越大,震动也愈激烈。因此,“退出”的操作方式也应当随着商业银行规模档次的差异而有适当差别。县域及以下银行,可以“清盘”,也可以“重组”;其中由民间资本掌控的银行,其产权组织形式应当是“无限公司”或“两合公司”,董事长及股东董事应当对“未能清偿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省域银行与市域银行,应当较多地选择“重组”。全国性银行及其他上市银行,由于已经是“大而不倒”了,因而在必须“退出”时,原则上均

应选择“重组”;并且,必要时,还应当给予临时性的财政资金支持以保障其稳定运作,如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政府对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等所做的那样。

3.要妥善处理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退出”问题。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是指来源于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机构。2003年以来,经过不断的改革,目前包括三个子类: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这三个子类机构均是在省农信联社领导下“行业管理”下的下级法人机构。

农村信用社名为“合作金融”,但实际上则没有半点合作性,实为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混合物。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性”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①农户小额贷款的定义。本来,农户小额贷款又是“小额”,又是“信用”,利率应当是相当的,然而,农信社发放的农户小额贷款执行的却是优惠利率,是农信社各档次贷款利率中最低的。这里实行的显然不是商业性原则,而是政策性原则。②贷款投向。农信机构的资金通常优先用于发放农户小额贷款,之所以如此,重要甚至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上级的行政指令。省农信联社每年对下级农信机构

下达任务指标,并且严格考核,与下级农信机构的高管的薪酬挂钩。③机构设置。国发【2003】15号文件《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明确规定:只要辖区内存在支农需求,农信社机构即应严重亏损,资不抵债,也不能撤销,只能降格或合并。显然,这里通行的不是商业性原则,而是政策性原则。

综上,很明显,只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辖区内存在着支农需求,那么,其“政策性金融”性质还是相当强的。因此,只有那些位于城区的或者城乡一体化程度相当高的地区的“农村商业银行”,由于辖区内已经没有了支农需求,才有可能消除政策性金融性质,进而有条件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基于此,应当把现有的“农村商业银行”中符合条件(即辖区内已经没有支农需求)的那部分机构划出来,列入商业银行“市场退出”法规的适用对象之中;而不符合条件的“农村商业银行”及全部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则不适用于该法规,暂时不搞“市场化退出”。

4.商业性银行的信息披露要有“大众版”,以落实公众的知情权。

目前,公众银行存款的安全是由国家提供的“隐性存款保险”来保障的。今后,在建立了商业银行“市场化退出”制度后,公众银行

存款的安全保障应当有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存款保险制度;二是公众对银行经营稳健性的知情权。后一方面相当重要。银行是社会性很强的机构,在台湾地区被称为“公器”,从而即使不是上市公司也要向社会披露经营信息。老百姓在了解银行的经营稳健情况后,便可以作出选择,把钱存到稳健性较好的银行中去,以策安全。

然而,目前银行的信息披露存在很大的缺陷:一是不及时,一年披露一次,而且还要等到下一年的4、5月份。二是太“专业”,完全是给专业人士看的,普通老百姓很难明白。三是太“偏僻”,仅仅刊登在某些专业报刊上,普通老百姓不容易看到。

为此,银行的信息披露需要有“大众版”。一则,每个月披露一次。二则,刊登在每个城市的日报或晚报上,包括在该城市的所有银行;三则,披露的内容简洁明了,主要是一些有关“稳健性”的重要监管指标,如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流动比率、存贷款增长等等;并且附上有关指标的解读。

实行这样的信息披露可能会对银行与监管部门带来一些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是好事,能够迫使银行及有关部门改进工作,进而提升整个银行体系的竞争活力。(完)